



美國反華組織踢走羅冠聰三個原因

銳評 卓偉

海外反中亂港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早前在社交媒體公開發出聲明,宣稱被香港警方通緝的羅冠聰不再是該組織的成員。

羅冠聰曾是HKDC的重要成員,多年來為其鞍前馬後,四處奔走,無功勞也有苦勞,現在突然被割席,甚至連原因也沒有交代,只用了寥寥數十字的聲明就將美國培育多年的「學生領袖」、「人權鬥士」掃地出門,事件自然不尋常,當中既涉及羅冠聰的個人操守、反中亂港圈子的荒唐行徑,亦關係到這些反中亂港組織近年因為無用武之地紛紛面對財赤困局,難以再養大批樁腳,更反映西方反華勢力正在調整策略,由明戰轉為暗戰,輿論成了主戰場。在這些因素疊加之下,羅冠聰成為棄子自然順理成章,也再次證明背叛國家背棄香港的人,天下雖大也不會有容身之所。

所謂「香港民主委員會」本身就是「黑暴」產品,也是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一個抓手,在2019年9月由朱耀明的兒子朱牧民和美籍華裔學者許田波共同創

立,自稱是無黨派、非牟利的組織,致力維護香港的自由、法治和自治云云,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因應「港版顏色革命」而成立的宣傳平台,旨在集結反中亂港分子,配合西方的輿論戰、媒體戰,並為外國的制裁吶喊造勢。

利用價值被榨乾成棄子

其中,在「黑暴」期間,李宇軒在徵得黎智英批准後,就曾把一份列有144名官員的制裁名單發送給朱牧民,並由朱牧民及HKDC將這份名單交予美國的反華議員,以作制裁之用。多年來,HKDC已成為「黑暴」分子的「集中營」和「避風港」,2021年HKDC換屆,由更激進的周永康接掌董事會主席,梁繼平接任總監,而羅冠聰則擔任「諮詢委員會」召集人。三名極端反中亂港分子執掌「香港民主委員會」後,更招攬了同樣潛逃海外的許智峯和張崑陽,所謂的「香港民主委員會」成為名副其實的「黑暴委員會」。但現在羅冠聰卻突然被「同道人」掃地出門,當中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據媒體報道,羅冠聰涉嫌在出任

立法會議員期間性侵犯其助理。事發在2018年,羅冠聰被指在一次外訪活動中借醉性侵犯了受害人,此事在「社運圈」內早已傳遍,當年羅冠聰為保形象,更向外反指其助理是「想出名」「博上位」。最令人側目的是,受害人還指出當年黃之鋒也有份進行性侵犯。但對於這樣嚴重的案件,卻被這些反中亂港分子以及其幕後勢力強逼下來,最終不了了之,受害人更因此患上創傷後壓力綜合症,時常會不自主地極度緊張,渾身冒汗。

這宗案件由於被強行壓住,成為了「無頭公案」,但公道自在人心,有關消息及傳聞一直在「社運圈」流傳,直到今日在網上仍有大量的內情和討論,早幾年這些反中亂港分子頭上都有光環,被西方媒體吹捧成「民主鬥士」,這些醜聞自然難以發酵,但今時不同往日,反中亂港分子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其醜聞也就重新浮出水面,向外界揭露了這些所謂「民主鬥士」、「社運圈」的荒唐和不堪,這對於依靠政治光環生存的反中亂港組織來說是致命打擊,唯有棄車保帥,與羅割席。

二是經過「黑暴」慘敗以及香港的撥亂反正,這些因「黑暴」而生的組織普遍面對嚴重財困,美西方眼見在香港已經難以掀起大浪,加上本國經濟同樣困難,近年相繼大幅減少撥款,亂港資金備多粥少,老牌的反中亂港組織尚且要勉強維持,更何況HKDC這些新組織。

美西方不是開善堂,多年來資助香港的「反對派」組織政黨,扶植眾多政客、所謂社運分子,不是為了什麼投資香港民主事業,而是要在香港培養大批政治代理人,以配合其「港版顏色革命」圖謀,通過暴力政變,主導香港選制,奪取香港治權,最終由這些代理人管理香港,這是「顏色革命」的主要配套,美西方每年撥出重金目的正在於此。

改變策略收買網媒大造水軍

但現在香港已經進入「愛國者治港」時代,外國代理人已不可能進入建制,暴力政變更是天方夜譚,羅冠聰等人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養養一兩個作「政治花瓶」或許問題不大,但卻不再是來者不拒。羅冠聰本身志大才疏,不學無術,加

上品德操守有虧,在「社運圈」聲名狼藉,既然反中亂港組織「莫財」,自然乘機將其掃地出門,以減少使費。而且,周永康等人雖然是羅冠聰「手足同道」,但資金就這麼多,「少隻香爐少隻鬼」,自然落井下石,減少競爭者。

三是反華勢力正在調整對港策略。過去培植代理人,然後通過選舉奪權的一套已經功敗垂成,大規模的騷亂亦難再來,再花大筆資金維持反華組織,是穩賠不賺的投資,美西方當然不會傻得繼續投入。

現在美西方針對香港的策略主要就兩條:一是不斷抹黑、削弱香港的營商環境,通過各種聲明、警告,無所不用其極對香港潑污,打擊香港經濟,挑動社會不滿,在香港煽風點火。二是主力放在意識形態的爭奪,投入資金成立大量網媒及網絡水軍,由潛逃外地的反中亂港分子經營,對香港進行各種抹黑、搞局,發動「認知戰」和「心戰」。近年各種「反對派」網媒如雨後春筍,西方媒體全面配合,足以說明美西方最新策略,在這個策略之下,羅冠聰等人自然沒有多大價值,成為棄子也是理所當然。

資深評論員

做好土地資源分配 實現產業多元發展



議事論事 胡恩威

適應新形勢,香港需要不斷改革創新。香港現在發展創科和文創產業,最需要的是土地空間,要最大化發揮其作用,需要政策或機制上的拆牆鬆綁。針對目前土地資源和規劃同步協調不足的情況,政府一些部門和功能可考慮整合,讓土地空間更有效率配合創科和文創等產業發展的需要。

城市規劃委員會是根據相關條例成立的法定組織,負責擬備香港地區的布局設計,及在該地區內建築物類型的草圖,促進社區的衛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行政長官委任6名官方及24名非官方人士為城規會成員,任期兩年。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規劃及地政)擔任城規會主席。

可邀請學術機構合作研究

城規會現在的運作變成議會模式,其實未能很好地應對香港產業發展需要。許多大城市的規劃都是研究主導,研究包含社區諮詢工作。香港土地規劃的問題在於長期系統性研究不足,而且很多前期研究工作都是外判給工程顧問公司負責。很少邀請學術機構或專家合作,進行長期城市發展的數據規劃和主題研究。例如文創產業需要怎樣的土地資源和空間?創科產業需要怎樣的土地發展模式?

目前負責城市發展的部門分工太細,缺乏整體性。以啟德發展計劃為例,運輸署、路政署、拓展署是各自規劃,而城規會只是單一地逐項地產項目審批。舉例而言,北部都會區發展中,區內一些傳統工業因政府收地面臨搬遷,例如鋸木廠、荳品廠、糖薑食品廠,以及有80年歷史的醬園等都受到影響。如果有宏觀層面的系統性規劃,情況或許可以更好。

香港要發展創科產業的話,土地資源需要分類:哪些土地資源留給房地產發展?哪些土地資源預留給創科產業發展?應該有一個更加清晰的分野。2021年全港有4077公頃農地,活躍農地佔約19%,其餘為荒廢農地。香港飲食業要維持競爭力,新鮮食材是一個重要元素,可考慮重啟本地農業發展。為何內地飲食業如此蓬勃?因為有「一條龍」優勢,由食材供應、商業租金、人工成本,都相對比香港便宜,可以把資源投入創新方面。而香港的餐飲業,接近一半或以上的成本是租金,所以更少資源能投入創新方面。非集團連鎖式的中小型餐廳就更加經營困難。又例如,觀塘工業大廈單位的商業用途,如何能在符合安全條件下出現更多創新的商業模式?或者以香港文化特色為主題的消費體驗,吸引遊客,增加文旅資源。

目前的公共工程,例如運輸系統工程或新區發展工程,大家到啟德新區看看,世界趨勢是綠色交通,例如步行和單車,但單車專道在新區基本上欠奉,將單車只視作一種休閒活動,但在不少城市,例如東京、台北、上海、荷蘭等,單車被視為許多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港島區北部沿海濱區域還可以規劃得更好,由西環海中心公園、中西區海濱長廊、金紫荊廣場、東岸公園主題區、連接到鯽魚涌寵物公園,沿途設置單車徑和緩步徑,帶動市民做運動的風氣。但因為涉及多個部門,海濱空間做不到一個既有餐飲業亦有休閒價值的旅遊資源。維港兩岸如何好好利用維多利亞港的景色?增添什麼配套設施?需要創新的概念。政府可邀請本地、內地或亞洲學術機構合作研究。

要發展旅遊產業,如何實踐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倡「無處不旅遊」理念?香港有很多海洋資源,例如離島、海岸公園和地質公園、海灘等,是否可邀請國外度假村合作來香港投資興建度假村或新酒

店?打造天然旅遊消閒區,這將是一個大型規劃的問題。

香港目前的大型基建工程,例如鐵路、填海、高速公路等,這些公務工程對於市民生活便捷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一個更宏觀的大布局。過往政府收入來源過分依賴賣地,隨地產市場調節,2023-24財政年度,政府的土地總收入196億港元,較原來預算少77%。政府要透過土地去造更多有盈利的公司,吸引更多國際實業和投資者到香港落戶,吸引外商到港落戶的工作。發展局可檢討如何提升其調研功能。

整合政府部門職能提升效率

發展局旗下設有九個部門:建築署、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機電工程署、地政總署、土地註冊處、規劃署、水務署。此外,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於2001年成立的市區重建局,扮演促進本港市區更新,應對市老化問題,改善舊區居民生活環境的角色。發展局可以檢視這些部門的功能和職責,考慮進行調整,以提高行政效率。

進行公共工程前的環評報告,例如政府將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部分土地興建住宅,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環評報告。環評報告基本上停留在文件層面上,只是依法定程序進行,保育問題要以理性和科學精神去處理。本地農業應該劃出專有區域去發展,而不是沿用發展高樓去構思。研究如何利用土地空間協助產業做大,而土地用途的分配不應硬如鐵板,最終只是把大量土地荒廢。新界大量棕地淪為露天貨櫃場、回收場等,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

政府需要有系統地進行土地資源分配的研究,香港其實可以發展多元化產業,尤其是文旅產業,更需要拆牆鬆綁,增加對遊客的吸引力。土地規劃的體制盡快進行研究、檢討和改革,才是提高香港競爭力的不二法門。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推動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新契機

智庫專欄 周嘉俊

近年來,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備受關注。研究顯示,每七位香港人中就有一位會經歷一般精神疾病,如焦慮症、抑鬱症等,意味着市民身邊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有可能正與精神健康問題搏鬥。自今年8月起,政府推出的「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正可以在社區為他們提供多一條出路,讓他們可以及早獲得支援。

「健康心靈先導計劃」於屯門、油尖旺及東區地區健康中心或地區康健站試行,為市民提供免費的精神健康評估服務,並將有需要的市民轉介至新生精神康復會或「香港心聆」作進一步跟進。有輕度至中度焦慮或抑鬱症狀的市民可獲得約6至8節低密度心理治療,例如認知行為治療、接納與承諾治療及靜觀為本治療等獲實證支持的介入方法。計劃不僅有助及早識別介入精神健康問題,更標誌着香港在推動分層護理模式方面的重要進展。

現時,醫管局精神科門診穩定新症佔總新症個案77%,而候候時間中位數則是由20至75星期不等(視乎醫院聯網而定)。這些穩定新症其實有大部分可以接受低密度心理治療,並在社區進行跟進。因此,「健康心靈先導計劃」將有效緩解目前精神科專科服務的壓力。通過在社區層面提供初步評估,並將有需要的市民轉介至非政府機構作進一步跟進,有助減輕精神科醫生及臨床心理學家的工作負擔。這種分層護理模式不僅能夠提高整體服務效率,還能確保真正需要專科治療的患者能夠更快獲得幫助。

此外,計劃有望幫助市民跨越標籤效應,敢於求助。研究顯示少於兩成出現焦慮或抑鬱症狀的市民願意主動求助。由於地區康健中心提供綜合健康服務,相比於精神科門診就醫,市民可以更放心,不怕造成標籤效應。同時,將精神

健康評估服務融入社區,可以降低求助門檻。因此,計劃不僅有利於早期發現和介入精神健康問題,還鼓勵更多市民及早關注自身的身心健康。

為進一步提升計劃的成效,政府可以考慮建立統一的跨專業數據溝通系統,連結地區康健中心、非政府機構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實現信息共享。這不僅可以避免市民重複描述病情,減輕其心理負擔,還能夠為服務提供者提供全面的病史資料,有助於更準確的診斷和治療。

政府可於下一階段擴大合作網絡,將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如家庭醫生和中醫,納入轉介體系。這不僅能擴大計劃的覆蓋面,還能充分利用醫療專業人員與市民長期接觸的優勢,及早識別潛在的精神健康問題。

「健康心靈先導計劃」體現了善用專科以外人力資源提供服務的重要性,有助減輕專科服務的壓力,同時擴大服務覆蓋面。這種創新模式不僅能夠提高精神健康服務的及可性,還能強化社會對精神健康的重視。

此外,計劃與香港整體基層醫療發展方向相呼應,有助實現從治療向預防的重心轉移,通過在社區層面提供評估及跟進服務,及早識別和介入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個案。這種以預防為重的方法與內地及世界各地的醫療發展趨勢一致,強調在日常生活中關注和改善精神健康,對市民的個人健康有利外,還能降低整體醫療成本。

「健康心靈先導計劃」的推出標誌着香港在應對精神健康挑戰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計劃將為香港建立一個更加全面、高效的精神健康服務體系奠定基礎,最終實現提升全民精神健康水平的目標。

團結香港基金醫療及社會創新研究主管

完善「高才通」大學評定標準



議論風生 李穎彰

特區政府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旨在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來港發展。計劃利用一套量化的評分系統,通過考量教育背景、職業經驗及年齡等多個因素來篩選申請者。計劃主要針對如高科技、金融及教育等特定行業,提供便捷的簽證程序及其他優惠,以推動本地經濟發展與創新進步。

「高才通」推出後大受歡迎,但其成效還可更佳。其中原因之一是計劃過度依賴QS世界大學排名及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排名(THU)來評估教育背景。這類商業色彩濃厚的大學排名,未必有助有關部門全面評估申請者的實際能力與專業技能,甚至影響香港實現更全面的專業發展目標。因此,需要一種更平衡且全面的評估方法,以更公平公正地評估計劃申請

人的資格。

QS及THE大學排名系統過分強調大學的學術聲譽,嚴重忽略了那些專注於實用教學和職業培訓的大學,這些院校可能學術研究上表現平平,卻在培養應用型人才,滿足經濟社會需求方面具有顯著貢獻。此外,這些排名標準常常忽視了教學效果、學生滿意度及大學的社會責任等關鍵因素。因此,過分依賴排名系統來作評估,會導致許多對發展有貢獻的人才被排除在外。

例如哈爾濱工業大學(哈工大)是全球首所在校園內成功發射衛星並使其進入月球軌道的學府,哈工大還參與了長征七號、天宮二號、神舟十號、嫦娥五號及天宮二號等重大載人飛行任務。然而,根據今年6月發布的QS排名,哈工大的全球排名僅為第252位。依照最初的評分標準,哈工大的畢業生被完全排除在有關計劃之外。所幸,特區政府作出了調整,於去年底將哈工大等內地著名大學納入其中。但儘管如此,增3間內地大學後,「高才通」計劃下的內地大學名單增至12間,仍佔

整體不足一成。

這類外國的大學排名,經常因為評估方法極不透明及與商業利益緊密備受批評。這些排名雖看似提供清晰、權威的衡量標準,卻缺乏科學依據,未能真實反映各所大學的教育質量與研究成就。其評估標準的局限性可能促使大學管理層過度盲目追求排名,導致對學院資源失衡配置,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學術及社會貢獻領域。

推動兩地建立資格轉換機制

這類排名系統的偏向性對學生、家長和僱主的選擇造成深遠影響,他們可能依賴排名而非實際教育質量或專業實力來做出決策。因此,這會導致大學功能被簡化,將其人才培养、學術研究和知識轉移功能縮減為數個簡單的市場導向指標,從而扭曲了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抑制了專業領域的創新與多樣性,特別是對產業能力或社會需求至關重要的非主流學科。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應當重新評估及看待這些排名系統,以真實反映各所大學的多

元價值與貢獻。

在當前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人才流動、專業認證及資格轉換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機制。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提出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這正好為香港引進專業人才方面提供了新的指導方向。建議特區政府從改革政策機制,尤其是優化完善專業認證及資格轉換機制。目前的人才評價機制過分依賴如QS和THE等國際學術排名,這些排名系統並不全面代表計劃申請人在專業實踐和技術應用中的能力。因此,特區政府可建立一套更加全面的評估框架,重新審視申請人的專業成就、創業能力、社會貢獻及其他專業技能。

此外,建議兩地加快完善香港與內地的專業認證及資格轉換相關機制。這不僅能夠促進大灣區各地的人才流動,亦有助於香港專業服務業的整體發展,提高香港在國際與區域內經濟的競爭力。特區政府

可設立一個跨境專業服務業協調小組,負責完善考試及認證機制,使大灣區內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能更順利地融入香港工作,並推動區域內的不同專業服務水平共同提升。

為確保人才政策能夠有效實施並配合發展需要作出調整,建議特區政府成立一個由專家學者、各行業代表,以及各部門代表等組成的協商機制,定期評估人才政策的實施效果,與發展需求的匹配程度。這種多元參與的政策制定過程,不僅能夠確保政策更具前瞻性和實用性,亦能夠使政策更好地對全球趨勢和區域發展的需要。

特區政府在面對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特別是大湾区發展帶來的新的機遇時,需要從多角度出發,全面改革、持續完善人才政策,推動兩地建立完善的專業認證及資格轉換機制。通過這些相關改革,香港不僅能夠增強自身的吸引力,同時也能在大灣區合作中發揮更積極的角色,共同推動區域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

執業律師